

教育时论

# 打击学区房炒作 守护机会公平底线

杨三喜

北京、上海、深圳等部分城市学区房价格快速上涨,甚至成为部分投资者炒作的对象。着眼于这一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提出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这是当下一段时间里,党中央对学区房炒作的鲜明回应,既是为了落实“房住不炒”的要求,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是维护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重要举措。

为什么要防止学区房炒作?因为这事关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哈佛大学罗伯特·帕特南教授曾组织研究团队,以数年之功,追踪访问了生活在美国各地的107位年轻人,出版了《我们的孩子》一书。书中依次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立方体差距。过去40年来,随着美国社会贫富两级分化日趋严重,美国社会出现了壁垒越来越严重的阶级隔离。越来越多的家庭居住在清一色的富人社区或者清一色穷人社区,居住隔离同时转化为教育隔离。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多就读于私立学校,或者居住在更好的学区内。即便他们和寒门子弟居住

在同一个学区内,也会择校而读进入学区内的好学校,随后进入更高层次的大学,拥有穷孩子不敢想象的机会和人生。种种现实表明美国梦已碎,机会平等更不可能。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像美国这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寒门子弟上升之路越来越难的情况绝不能在我国出现。

机会公平中,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保障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让每个人都有出彩的人生,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基础。炒作学区房带来的结果是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富裕阶层的“特权”。这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不公平。

发展义务教育,确保每个适龄儿童平等的受教育权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系。公益、普惠是义务教育的特征。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避免因住房增加民众经济负担,扩大教育不公的情况加剧,实际上就是从教育公平、机会公平的层面出发,防止出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情况。这不仅仅是教育问题、经济问题,也是一

个政治问题。

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在于依法保障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益,为择校热降温,减轻中小学生升学负担,但在推进过程中也衍生出了学区房问题。学区房之所以成为炒作房价的工具,根本原因在于优质教育资源总量相对不足与分配不均。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汇聚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但学校的供给增速赶不上学位的需求增速。同时,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民众对高质量教育的需求更加旺盛,这就出现了在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丰富的城市中,教育资源争夺战反而最为激烈、学区房炒作最为火爆的情况。

为学区房炒作降温,根本举措在于做大蛋糕,扩充优质教育资源总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从而淡化学区房的学区属性。但从现实条件来看,新建、扩建学校面临很多制约,尤其是大城市的老城区,用地紧张是阻碍新建、扩建学校最主要的因素。优秀教师的培养同样需要时间,无法一蹴而就。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总量的增长以及分配的均衡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只有提前规划,不

断增加政策、资源、经费投入,不断攻坚克难,才能不断满足民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为学区房降温的另一个方向则是调整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比如,变“单校划片”为“多校划片”,解除住房与学位的“强捆绑”关系,推动“指标到校”、推进集团化办学等,从在区域内均衡分配教育资源入手来为学区房炒作降温。

虽然政策方向是推进教育公平发展,但由于不同群体间利益诉求不一致,在调整划片方式、重新划分学区的过程中,容易产生利益纠纷乃至冲突。比如,从“单校划片”改为“多校划片”之后,一所学校对应的学区范围扩大了,意味着更大范围内的孩子有可能享受优质资源,但是对于之前独享资源的社区来说,却感觉到利益受损。于是就出现了一方欢迎,一方强烈反对的情况。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可以理解,但是义务教育必须坚持公益性、普惠性原则。化解这种多元矛盾冲突,既需要教育部门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化解资源争夺焦虑,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认同。

又比如,很多地方新建了学校,但在划分学区的过程中,一

些市民却发现新学校近在眼前却上不了,甚至同一个小区内不同位置的住房也被区别对待。有的教育部门解释,“就近入学”不等于直线距离最近。可是对于民众来说,“明明学校就在自家门口,孩子却不能就读”是难以接受的。面对学区划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妥善处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要求教育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对学区内的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开度,通过听取居民意见、召开听证会、公示学区划分方案等方式,确保民主决策、公开透明,确保民众“看得懂、理得清、说得明”,用看得见的公平弥合争议,推动改革的推进。

学区房炒作的热度,是评价区域教育均衡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也是评价地方政府履行义务教育发展责任的重要依据。区域教育真正均衡了,学区房炒作就失去了动力;当区域内校际差距巨大,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学区房炒作就会层出不穷。所以,各地要把防止学区房炒作作为一个民生工程、一项政治任务加以重视和解决,守住机会公平、社会公平的底线。

(作者系本报记者)

微言

## 提升学科声誉 营造创新氛围

徐海鑫 刘妹雯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十四五”期间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近年来,我国高校在学科建设、科研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较,我国当前的高水平创新人才仍显不足,师生科研创新积极性还没有完全被调动起来。学科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的提高对高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的科研水平提升、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和等方面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提升学科社会声誉既是建设一流大学的题中之义,又是营造浓厚科技文化氛围、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要深刻认识创新核心地位,发挥高校科技创新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被放在首要位置;2021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创新和科技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是近三年中最高。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要充分发挥在创新领域的重要作用,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要结合高校学科发展实际,制订学科社会声誉提升计划。在日益激烈的国内外竞争面前,高校不仅要抓好学术成果、科研平台等学科“硬实力”,还要抓好社会声誉和影响力等学科“软实力”。当前,高校在提升学科社会声誉的过程中,面临高峰学科实力与师生、业界、大众认知不匹配,特色学科知名度不高、特色不特、亮点不亮,交叉学科宣传各自为战、缺乏指导、宣传效率不高等诸多困难。解决上述问题,可从多方位、多角度、多渠道入手,如通过挖掘出一批具有宣传价值、但尚未充分被报道宣传的学科专业,借助广播电视、校园网络、校报校刊等校内外媒体平台,持续推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深度报道、特色报道;也可以通过建立多学科宣传协同会商机制和宣传平台,广泛宣传及时报道多学科联合攻关成果。重点是高校要结合自身实际,根据不同学科的发展状况,制订相应的学科社会声誉提升计划,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学科声誉和社会影响力提升工作模式。

要营造浓厚的科研创新氛围,激励师生勇担科技创新重任。在开展学科社会声誉的媒体宣传和系列社会活动中,不仅要提升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还要注重在师生中形成人人想创新、人人能创新、人人会创新的浓厚氛围。重点是要激励师生勇担科技创新的时代重任,引导他们把服务国家发展作为一种追求,主动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创造更多一流创新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要大力宣传报道党中央对科技工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引导师生深刻认识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鼓励他们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勇攀科技高峰;要宣传报道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我国当前面临的“卡脖子”技术问题,引导师生对标国际科技前沿,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集中力量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要大力宣传广大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激励师生以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既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又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多出高水平原创成果,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

(作者徐海鑫系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刘妹雯系四川大学党委宣传部科员)

## 做互联网时代的“大先生”

聂书江

“互联网时代下老师还能干什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科技和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传统授课模式被颠覆,网课成为社会化学习的宠儿。

互联网确实激发了教学的潜力。一方面,数字校园建设以及“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等扩展了课程资源;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使教师可以通过更有效地“充电”,来提升备课上课质量和互动交流频率,让精准教学成为现实。例如,有教师在化学课上借助互联网AI技术,把分子构型以3D的形式展示出来,大大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然而,随着互联网教育的过度扩张,最近几年,舆论场上却出现了“教师夕阳论”“课堂无用论”的论调。比如,有人认为既然学生能够在网络平台上选择课程,甚至定制课程,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教师了。还有人直言,未来网课将代替课堂,虚拟主持人将代替教师。这种对教师职业产生的质疑体现了人们对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定位和教育理念的迷茫。

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角色定位比较固定,教学主要的路径体现为“书本—课堂—学生—作业”的流程。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模式。一方面,全国几乎所有网民都利用手机上网,传统模式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下学生获取知识的习惯;另一方面,教育公平的需求难以被满足,比如偏远乡村和教育相对落后地区的优质教学资源匮乏问题。所以,在互联网的加持下,教师的角色逐渐发生转变:一是从学习资源的提供者变成了资源的整合者;二是从课堂的管理者变成了课堂的组织者;三是从知识的传播者变为知识的启发者、学习的引导者。

新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教师价值的降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使我们认识到,很多学生由于网络自主性的增加,容易下意识地只关注自己心理舒适的内容,而忽略学科本身的逻辑。同时,由于网上资源良莠不齐,许多不适合青少年的内容影响学生的自律性甚至价值观。如果没有教师的启发指导,学生就像闯入玩具店的孩子,惊喜、好奇、迷茫而难有收获。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给教学理念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传统教学模式,教学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学生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新时代的教育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每一个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不是成为考试机器人。

所以,教师依然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要研究真问题,着眼世界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要坚定信念,始终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人才需求、教育形态,乃至教育理念。目前,我国数字教育资源开发与服务能力还不够强,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与应用水平还不高,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基本具备但信息化教学创新能力尚显不足,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不够,高端研究和实践人才依然短缺。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继续支持“互联网+教育”计划,借助互联网技术给教师提供更大的平台,拓宽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促进教育公平。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教师的角色和价值,发扬互联网时代下的新教育理念,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与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焦点时评

# 别让高校被“榜”架

张志坤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各种形式的高校排名排行很活跃,具体表现为各种“榜”越来越多。进口“榜”有QS世界大学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最佳大学排名榜等;国产“榜”有武书连中国大学排行榜、校友会大学排行榜、上海软科世界大学排名等。现如今的中国高校,不管什么类型,也不管是身处闹市还是远居幽谷,都不能不屡屡上榜上榜,一年之内少则七八次,多则数十次,月月见榜不是新鲜事儿。

对于这个现象,其中的积极意义是有的。一是高校受到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是学校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二是对高等院校的评估评价开始向第三方倾斜,出现“官民两家”并驾齐驱、并行不悖的态势,这是好事,也有利于促进高校的内涵发展。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高校的各种排名排行如此一哄而上,难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生出很多弊端,其中几点很值得注意。

其一,造榜、排榜并发榜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大生意,逐利本性十分鲜明突出。搞排行榜并不是一项公益事业,这件事之所以能让许多人争先恐后、趋之若鹜,关键还是市场机制与资本动力在起作用。正所谓无利不起早,排行榜大多起因及声誉影响,不得不为此倾注相当的人力物力予以应对。

其二,买单的是高校,最后一切负担都要转嫁到高校身上。搞各种排名排行耗资不菲,需要相当大的资金与资源投入,其中的负担转来转去,最后买单的还是高校。许多高校因顾及声誉影响,不得不为此倾注相当的人力物力予以应对。

其三,除少数名牌高校,大部分高校为此疲意不堪却无可奈何。

何。坦率地说,各种排名排行只能是少数名牌高校的盛宴,而对大多数高校则苦不堪言,尤其是那些发展环境不利、条件保障薄弱的高校,看到排行榜发榜简直如同穷人过年,成了一个难关。这些高校或忐忑不安地寻找自己是否榜上有名,或心惊肉跳地看自己榜上排位起伏,或喜或忧、不可名状,不可能不背负精神与情绪压力。

鼓励发展社会主导的对高等教育的第三方评估,要不要采用排名排行这种方式,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使用这种手段,实在大可商榷。中国高等教育如同广袤森林,其中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千姿百态、各有特色,不能用一把尺子或者一个标准来衡量。这样做既不科学也不公正。

所谓不科学,是指把各种类型的高校搞到一个榜上来排名排行,譬如用一把尺子测量马牛

羊,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高校的个性。我国的高校是适应国家经济产业布局的产物,各有鲜明属性。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尽管出现了综合化、同质化倾向,但大多数高校的底色仍然具有鲜明的行业色彩,存在明显不同的职能分工。譬如“国际化”指标,这是各种排名排行榜中的重要分值项,但一所高校外国学生多少同学校的具体属性职能密切相关,将其作为学校办学水平的一个衡量尺度,实在有失偏颇。所以,把该指标当做排行要值,有可能导致一些高校不择手段地吸引外国学生,进而发生恶性竞争,给高校声誉带来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所谓不公正,是因为各高校新生入学分数、就业比率同具体行业、专业以及地域、环境密切相关,譬如母鸡下蛋、奶牛产奶,各有各的功用。许多高校本就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让他们同

场竞技,有失公允。

随着高校排名排行走向常态化,排名次序俨然成了高校等级次第的标签。长期如此,不仅高等学校的价值市场化、商业化之嫌,而且在其影响之下,社会公众对高校的认知也有可能发生偏差,从而进一步助推高等教育的分裂与分化,导致高等教育发展更加不平衡。高校排名排行涉及教育评价评估的主导权与主动权的大问题,其不应被社会化、市场化。我们应立足国家教育发展大势,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大局出发,从更专业的角度予以评价。

鉴于此,国内的高校排名排行活动可能已到了该降一降温的时候了,让高校从“榜”架的状态下解脱出来,使之放下这个不应有的包袱,实现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发展。

(作者系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

# 答好人口趋势带给教育的新命题

马亮

人口与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交互关系,人口对教育提出了需求,而教育则持续推动着人口流动和结构变化。人口规模、空间和结构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政策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否则就会导致教育资源错配和教育质量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披露的主要数据,特别是人口的年龄结构、空间分布和城乡布局等内容,对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政策调整有重要意义。

从人口受教育情况来看,七普数据显示2020年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达15.47%,比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8.93%增长了73.2%,是各类受教育程度中变化幅度最大的。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9.91年,有13个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10年以上。这表明过去10年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势头强劲,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提升。

在越来越多的人有大学可上的同时,上学难转化为上好学的问题。基础教育阶段,让孩子们享受公平优质的教育,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进一步做好高等教育的扩容增量和提质增效,优化高教资源在各地市的布局,使更多青年有机会跻身知名高等学府,需要重点关注。

2020年与2010年相比,总人口增加7205万人,增长5.38%,人口增长速度较2010年有所放缓。虽然我国人口未来仍然会处于增长通道,但是很快将会达到人口峰值。为此,需要考虑通过补齐学前教育的短板来提升人口出生率。

许多独生子女和双职工家庭,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学龄前儿童入托问题,那么就很难真正激发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因此,要加大对学龄前儿童的托育投入,借助市场力量来扩大有效供给;加强托育服务产业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使之成为未来提升人口出生率的重要措施之一。

人口增速放缓也意味着要做好基础教育学位供给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作。基础教育资源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不充分问题还将继续存在,因此要做好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帮扶工作,使教育资源更多向人口流入地倾斜。

七普数据还显示,2020年中国有超过63%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人口比例比2010年上升14.21%。这表明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集聚,并给城市教育资源配置带来新的挑战。此外,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超过1.1亿人,与2010年相比增长192.66%,这可能导致学位分离问题进一步凸显。如何进一步做好市内学位的公平高效配置,将是未来一段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扩大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区域,实现中小学贯通制学位分配,都可能是未来需要考虑的政策选项。

当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流动人口的家庭随迁和子女教育问题,就关乎新型城镇

化的质量和市民化的进程。目前以户籍和住房等为依据来分配教育机会的政策,需要考虑在流动人口加速市民化的背景下如何调整。不让流动儿童和未成年人掉队,为他们提供公平优质的城镇教育,就成为教育政策面临的重大挑战。否则,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解决,将可能使新市民面临阶向上流动的天花板,乃至出现贫困代际传递,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包容性推进。与此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政策背景下,要让乡村儿童和中小學生可以就近入学,在享受优质教育的同时可以不忘乡愁。

七普数据表明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8.7%,其中65岁及以上占比13.5%,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来临,如何让终身教育成为老年人的生活新常态,就成为成人教育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人口老龄化使成人教育事业发展前景广